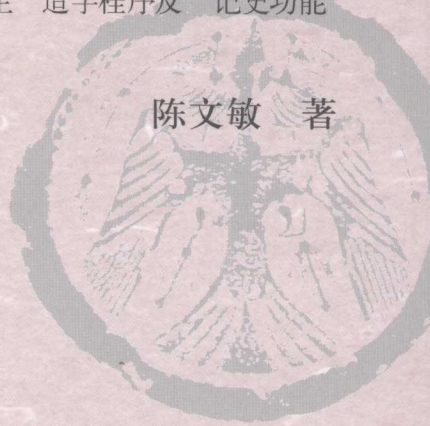


文史哲研究丛刊



# 汉字起源与原理

甲骨文金文的六书“五步相生”造字程序及“记史功能”



陈文敏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 汉字起源与原理

甲骨文金的六书“五步相生”造字程序及“记史功能”



陈文敏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起源与原理:甲骨文金的六书“五步相生”造字程序及其“纪史功能”/陈文敏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4830-9

I. 汉... II. 陈... III. 汉字-字源-研究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3594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汉字起源与原理

——甲骨文金的六书“五步相生”造字程序及其“纪史功能”

陈文敏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字数 300,000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4830-9

H·53 定价: 39.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人类学家的研究原始宗教与其说是为要完成宗教学,毋宁说是为要完成原始文化的研究。因为,在原始社会只有宗教一方面最为显著,哲学与科学的思想尚在萌芽,且尚在宗教的范围内。所以,要了解原始的心理,只有探索原始的宗教;要晓得人类初时的宇宙观,只要探索他们的宗教;要晓得他们对于自然界的解释,也只要查问他们的信仰;要了解社会上各种事件如神权政治、宗法制度、生产、死亡、婚姻、战斗的仪式、耕猎、畜牧、衣食、住所等的习惯,都可以参考原始的宗教而得解释。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华夏民族的先史时代是极其灿烂而浪漫的。但是,宋明以后文明臻于成熟,成熟则呈老暮,老暮则失去了浪漫的华彩。因之,这个民族在清代的语言考据和二十世纪初的新考据学(古史辨学派)中,竟迷失了民族文化的自我,数典乃至忘祖,竟迷失了民族的本源。殊不知,华夏民族本是来自天上的民族。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



## 序言 古汉字与西周以前的 原始宗教神话意识

文字是文明的根基。任何一个文明，一旦抽去她的文字，这个文明就会进入黑暗时代，就会回到原始社会。文字就像太阳一样照耀着人类文明前进的道路，文字又像一双无形的巨臂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原始走向成熟、从暗淡走向辉煌，甚至可能从繁荣走向未来的神圣……正是因此，人类对文字的感恩之情深如大海；正是因此，人类才建立了文字史和文字学。人类渴望知道文字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原理，以使用人类对文字的无限感恩来纪念她那伟大的圣诞。然而，“庭院梅花几度开，天涯游子久不归”。文字的由来，大多不明。例如作为世界三大古老文字体系的古埃及圣书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以及至今还支撑着中华文明的中国汉字，她们的来源至今都锁在云山雾海之中。对此，人类的寻根之心是黯然神伤矣。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脊梁，对于她的起源的探索也一直是困扰中国文字学界的难题，对于汉字的起源和早期的原理也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著。对此，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心亦然是黯然神伤矣。

胡澱咸先生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问题<sup>①</sup>》一文中说得好：“在目前，要提出一个合乎科学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还是困难的。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理论问题，既缺乏一个合乎科学的文字学理论。任何一种科学，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合乎科学的理论。用这理论指导研究，才能有正确的方法。古文字学现在诚然已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其研究的对象有一定范围。但中国古文字乃是汉字的一部分，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篆文，到隶书，到今天还使用着的楷书，一直延续未

---

<sup>①</sup> 见《安徽师大学报》1990年2期《考释古文字的方法问题》。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0年7—12期。

断,其演变发展是连续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中国文字学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古文字的研究也才能有科学的方法。而中国文字学却没有一个合乎科学的理论。”我们在多年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过程中深感这个“合乎科学的理论”之核心,应当正是对于中国上古社会的“原始宗教神话观念”的运用。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古人的古汉字系统是建立在古人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古人的世界观,不懂得他们的所思所行,那么对于反映他们的意识和行为的古汉字世界,我们就可能“一知半解”。所以,欲要建立一个“合乎科学的文字学理论”,首当其冲的,就是践行对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时代(包括这个时代的末期:商代)的“原始宗教神话观念”的深入研究和理解。非此,不足以深入古汉字体系的五脏六腑、奇经八脉;非此,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合乎科学的中国文字学理论体系;非此,不足以了解我们华夏民族的上古现实世界和上古文字世界;非此,亦不足以深入了解“六书”的原理和来源。这个道理,即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在中国历史年表上,夏代以前,被称作“神话传说时代<sup>①</sup>”,这是华夏文明的发祥期,也是古史研究最迷茫的一段,其中充满了种种历史之谜。如黄帝是“大电光”之子<sup>②</sup>、炎帝是“宏身而牛头<sup>③</sup>”、后稷曾“诞降嘉种<sup>④</sup>”、女娲曾“炼石补天”等。华夏文明的发祥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种种“神素”的、内涵极其渊深的古老时代。从汉字的大量起源史料看,古汉字的原始系统,正是从上古神话传说时代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在古汉字的浑身上下、五脏六腑、筋骨血脉、灵魂气魄中,都充满了上古神话传说时代的种种“神素”。所以,不懂上古神话传说,不运用上古先民的“原始宗教神话意识”来研究古汉字,那么古汉字的许多谜底都将难以揭开,统领古汉字的“六书”理论也将难以诠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

① 新出的历史年表改称“历史传说”,有把“神话传说”视为历史的意味。

② 《帝王世纪》曰:“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

③ 《孝经纬·援神契》曰:“(炎帝)神农,宏身而牛头,龙颜而大辰。”

④ 《诗经·大雅·生民》曰:“(后稷)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著名神话学家袁珂说:“后稷是天帝的儿子,从天上带了百谷的种子下来播植在凡间的。《书·吕刑》说:‘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也就是这个意思。”(《古神话选释》袁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2页。)

“以古人之心，度古人之事”，必须借古人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古人的文化遗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深谙古汉字及其六书理论的来源和原理。

六书是关于汉字创造方法的传统理论。然而，对于六书的来源和原理，中国文字学界迄今没有完全的认识。关于六书的来源，先前学者多以为在汉代，在汉代的刘歆、郑众、班固、许慎这四位大儒。然而，这四位大儒的六书说法多是只言片语，远未形成理论体系。关于六书的“指事、象形、转注、会意、形声、假借”这六种造字方法，自东汉许慎迄今近两千年来，学界一直无法完全搞懂。尤其是其中的“转注”一书，自古迄今，都在云遮雾障之中。我们在多年研究甲骨文体系的造字方法和系统构架的过程中发现：所有甲骨金文的造字方法均系六书，概莫能外；六书最合适的文字对象绝不是周以后的籀篆隶楷而是商周甲骨文。只有商周甲骨文才能充分地、完整地体现六书的系统原理，周以后的籀篆隶楷因形体的不断演变，已经在背离六书原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越来越不能充分体现六书的个体原理和系统原理了。由于六书的文字对象是商周甲骨文，所以六书产生的时代也必不在汉代，而理当在甲骨文创造和使用的时代。这个时代，至少在商代晚期。而学术界又普遍认为，汉字的产生时代理当不在商代晚期而在更早的时候。例如唐兰先生就认为汉字起源于夏代。《尚书·多士》也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说，殷商民族在其先公先王时代就已经有“典”“册”存在了。我们在考古学上看到一个较为确凿的证据，这个证据意味着古汉字原始系统的创造时间可能至少在4000年前。这个证据就是距今约4000年前的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黑陶鱼簋形陶罐上的“↑(上) 𠄎(五) 𠄎(戈) 𠄎(日)①”四字，这是我国考古学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句的古汉字证据，是我国“最早的文章”。这句类似于诗经“四言韵语”的陶文表明：至少在4000年前，系统的中国古汉字理当已经投入使用。此外，还有更早的文字学证据，那就是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至8000年前的陶文中的“转注

① 李学勤先生从左往右释为“巫(𠄎) 戊(𠄎) 五(𠄎) 俞(↑)”，认为是指神巫所用的五对钺。(见《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吴学研究专辑》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一文)我们认为应当从右往左读为“上(↑) 五(𠄎) 戈(𠄎) 日(𠄎)”，意即：“从天上(↑)乘坐雷神(𠄎)而下的天神戈(𠄎)是我们的太阳神(𠄎)。”详考见后《陶文与六书》。

字”。本书的最大创获就是解开了千年未决的“转注之谜”(详“转注”一章),由此我们知道转注字是系统化造字的结果,在转注字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庞大的古汉字原始系统。也就是说,转注字是成熟的古汉字原始系统已经出现的标志。而在以下这些 6000 年至 8000 年间的古老遗址中,我们见到不少属于甲骨金文体系的转注字:如距今约 8000 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陶文亅(单)转注字;距今约 6000 年前的湖北宜昌杨家沟陶文米(帝)转注字、丌(不)转注字、I(单)转注字等;距今约 6000 年前的陕西半坡和姜寨陶文X(帝)转注字、T(单)转注字等。注意,这些字都是清一色的表示上帝的转注字(考释详见“转注”一章),这又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普遍存在对上帝的信仰。近期媒体又报道了在安徽省蚌埠市双墩遗址发现的约 607 个刻画符号,这些符号距今约 7000 年。蚌埠市博物馆徐大立先生说:“它的许多符号与甲骨文、金文极为相似或者完全相同。同样,也有许多符号至今保存在少数民族的文字之中。因此,它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sup>①</sup>。”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面对双墩遗址令人震惊的众多刻画符号说:

这些发现不仅对文字起源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而且给了文字起源的学术理论一次重新检讨的机会。不仅对这个地区、对中国、对整个人类文字起源问题应该怎样去研究,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遵照什么样的理论和学说,给了一个考量和反省的机会<sup>②</sup>。

李学勤先生在这里提到两个“机会”,即“检讨的机会”和“反省的机会”,发人深省,令人深思,意味深长。双墩刻划符号的文字性质一旦被确认,中国文字的起源时间至少要前推四千年。再就是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仓颉造字”传说,这个传说又把汉字创造的时间指向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在 5000 至 8000 年前)。这个传说讲仓颉的造字总法

<sup>①</sup> 见《中国文物报》2005 年 12 月 16 日《探寻中国文字起源的重大发现——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

<sup>②</sup> 见《中国文物报》2005 年 12 月 16 日《聚焦淮河考古——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研讨会纪要》。



是“相生为字<sup>①</sup>”，而我们发现的甲骨金文六书造字总法正是“相生”，二者恰恰相互吻合！这又意味着有关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有较大的可信性！也就是说，在极其古老的黄帝时代古汉字原始系统可能已经存在。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有关汉字起源的传说与考古学证据正在渐渐地趋于吻合，并且共同把汉字的起源时间指向极其遥远的上古时代。这个时代，近及3000年前的商代，中及澄湖陶文“↑ 𠄎𠄎𠄎”所标志的4000年前，远及传说的“仓颉造字”的黄帝时代。所以，六书的来源也至少在3000年前的商代，远及黄帝时代。

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中国古汉字的六书造字方法必然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存在深刻的联系，必然是以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其造字方法的观念基础。所以，不能确定六书的产生时代，也就不能深入了解六书的理念、方法和目的。我们把六书的产生时代确定在商代及其以前时代这个大范围内。而从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主要是商代甲骨金文）看，商代社会是一个巫教信仰达到白热化的原始宗教社会，那时的先民视上帝为太阳神，早晨要迎日，晚上要送日，诸事都要占卜贞问于上帝。殷商人认为，自然人间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和统治的。例如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说：“卜辞中的上帝有很大的权威，是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sup>②</sup>。”黎虎在《夏商史话》一书中也说：“商代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念，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上帝——祖先崇拜。上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主宰宇宙万物和人间的一切。商代的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sup>③</sup>。”我国著名甲骨学权威胡厚宣在《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一文中对商代卜辞中反映的上帝信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他总结说：“从丰富的甲骨卜辞看，殷代在武丁时就有了高高在上主宰着自然和人类一切命运的‘统一之神’的宗教崇拜。殷人相信在天上存在这样一个具有人格和意志的至上神，名叫帝或上帝<sup>④</sup>。”从甲骨卜辞记载看，殷代至上神帝的权能是极大

① 《路史前纪六·史皇氏》曰：“仓帝史皇氏创文字，形位成文声具，以相生为字。”（考释详后）

② 《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62页。

③ 《夏商周史话》黎虎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04页。

④ 《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第25页。

的。然则殷商人的上帝信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商代以前的社会意识形态也理当与商代相去不远甚至基本相同。探索商以前社会意识形态之特征的史料主要可分为三大板块,即“商周甲骨文”“上古岩画陶文”“上古神话传说”。从这“三大板块”的情况看,商以前的史前时代也同样是与商代社会相同的原始宗教神话时代,那时的先民也同样虔诚地崇拜着创造自然人间一切的上帝太阳神。例如4000年前的澄湖陶文“↑(上)𠄎(五)𠄎(戈)✱(日)”这句话就是讴歌太阳神戈的,而戈正是属于殷商人的“三天神”概念,在上帝之列(参看图44、43、41,及“上古三天神概念”一节)。因此,研究古汉字的起源和原理,都必须以商代及其以前时代的“原始宗教神话意识”为观念基础,只有在这个古老的观念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古汉字的起源和原理,此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正如我们的“宗教学”“神话学”都不是为了宣扬宗教的迷信和神话的荒诞一样,我们运用先民的“原始宗教神话意识”来研究古汉字,也绝不是为了宣扬祖先的原始宗教神话观念,而只是依托原始宗教神话时代的历史大背景来对汉字的起源和原理等问题进行科学的质疑。

关于宗教在原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林惠祥先生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说:“人类学家的研究原始宗教与其说是为要完成宗教学,毋宁说是为要完成原始文化的研究。因为人类文化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灵;而心灵的表现文明社会有很多方面,除宗教外尚有哲学及科学,在原始社会则只有宗教一方面最为显著,哲学与科学的思想尚在萌芽,且尚在宗教的范围内。所以如要了解原始的心理只有探索原始的宗教。我们如要晓得人类初时的宇宙观,只要探索他们的宗教;我们如要晓得他们对于自然界的解释,也只要查问他们的信仰;我们如要了解社会上各种事件如神权政治、宗法制度、生产、死亡、婚姻、战斗的仪式、耕猎、畜牧、衣食、住所等的习惯,都可以参考原始的宗教而得解释<sup>①</sup>。”研究古汉字世界也是这样,我们必须紧扣上古社会的原始宗教神话观念,才能得古汉字原理的髓核。

<sup>①</sup> 《文化人类学》林惠祥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版,1991年第2版,2000年第3次印刷,第218页。

人类文明起源于神话。没有神话就没有人类文明。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种种传说都充满了神话。不管是华夏文明,还是世界各民族的远古文明,都是起源于远古神话传说时代的。人类对于自己童年时代的记忆中充满了神话。而恰恰正是上古神话,却偏偏是当今人类理性世界的谜团,人类对于洪荒时代那些光怪陆离的神话传说始终难以理解,不可思议,莫名其妙,混混沌沌,迷迷茫茫。而拉法格在《宗教与资本》一书中却说:

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对于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sup>①</sup>。

中国的上古神话传说时代,实在正是一部“天帝史”。例如我们的元祖黄帝,就是一位半人半神的伟大的皇祖帝考<sup>②</sup>。黄帝既是人,又是飞天的神,他既是黄帝部族的首领,又是居于昆仑神山上的天神;他既可以乘龙上宾于天国,又可以下凡施教于庶民。对于这样的皇祖帝考,不仅今天的人不知所何,就连两千年前的史学泰斗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喟然叹曰: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

从司马迁迄今,中国史学家一代一代,前赴后继,为探索古神话传说时代的历史真相,呕心沥血,韦编三绝,却仍然搞不懂孕生黄帝的“大电光”、驱不散蚩尤喷出的五里云雾……宋健在1996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发表了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为题的讲话,其中说:

① 《宗教与资本》拉法格著,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2年,第2页。

② 商周铭文中也称上帝祖先神为“皇且帝考”(且读祖)。

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适<sup>①</sup>。

这样的看法在史学界具有普遍性。诚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不知道本民族的发祥史不足为奇,然而作为一个伟大民族来说,不知道本民族的发祥史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然而,华夏民族的发祥史的确至今都不能明朗。例如关于黄帝真相的探索,曲辰在《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一书中说:“假如有一位外国人问我们:你们说黄帝是你们的祖先,然而黄帝又是一位天上的神仙,黄帝到底是人还是神?我们被问的同胞,大概是要出一头冷汗的<sup>②</sup>。”叶林生在《黄帝考》一文中说:“这位先祖的真容一直隐匿在神秘的云雾中,是有还是无?是神还是人?是人还是物?是土生还是外来?这些问题至今不能了然<sup>③</sup>。”我国著名史学家庞朴在《黄帝考源》<sup>④</sup>一文中以其深厚的古籍学功力,引证大量古籍资料分析认为:黄帝原来是一种“状如黄囊,赤如丹火”的东西。并得出结论:“谁也想不到,黄帝竟是黄河波涛上的一具革囊。”“革囊”就是浑牛皮充气而成的牛皮筏子。但是,说中华民族是“革囊”的后裔,这恐怕只有退化了的巫师才会相信。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也总结古籍中对“浑沌”(即庞朴说的黄帝)的各种描述而认为其特征有四:①黄色圆球;②有时红如丹火;③有翼无足能飞;④漫无轮廓<sup>⑤</sup>。这与庞朴先生归纳出来的“状如黄囊,赤如丹火”是基本相同的。那么,这类“状如黄囊,赤如丹火”的神圣之物到底是什么?我们根据对商周甲骨金文、上古岩画陶文与上古神话传说的结合研究认为:这类“状如黄囊,赤如丹火”的东西,其实就是古神话中太阳神(也叫帝、上帝、高祖夔等)的交通工具——雷神。

“雷神”神话是上古原始宗教神话意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上古图文史料中,雷神是天帝的交通工具,言雷神即犹如言天

① 《新华文摘》1996年6期《超越疑古,走出迷茫》。

② 《轩辕黄帝史迹之谜》曲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③ 《江海学刊》1994年2期《黄帝考》。

④ 《新华文摘》1993年8期《黄帝考源》。

⑤ 《诸神的起源·目录》,何新著,三联书店1986年。



帝,言天帝即犹如雷神。所以,不能深入了解“雷神”神话,古汉字关系网络的很大一部分文字的形体本义就无法搞懂。在上古图文史料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既可以上天、又可以在江河湖海中出入的飞行之物。这种神话事物在古籍中被描绘得绚丽夺目,灿烂辉煌,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而在古岩画陶文和古汉字关系网络中,又被描绘成一种形体多样化的飞行之物。“雷神”在古神话传说中有多种异名(同格异名),如“大电光”“雷神”“雷兽”“夔”“夔牛”“虺牛”“龙”“凤”“神龙”“龙马”“流星”“瑶光”“明神”“大虹”“虹”“神龟”“灵龟”“巨鳌”“巨槎”“贯月槎”“挂星槎”“古蛇”等等。“雷神”在古汉字系统中也有许多异名,如☉(日)☼(帝)夨(夔)𪚩(祖)𪚪(俎)𪚫(中)𪚬(五)𪚭(师)𪚮(龙)𪚯(凤)①等等。由于“雷神”是天帝上天入海、巡抚人间的交通工具,所以先民有时也用上帝之名来称谓雷神。例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曰:“东海之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鸣,其名曰夔。”这里所说的“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鸣”的“夔”就不是指殷商卜辞中的上帝高祖夔(详后“上帝——高祖夔”一节),而是指上帝高祖夔的交通工具雷神。“雷神”一词是我们从上古图文史料中选出的典型名称。如《说郛》引《奚囊橘柚》曰:“轩辕游于阴浦,有物焉,龙身人头,鼓腹而遨游。问于常伯,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则见,见必大雷雨而拔木,君亟呼乎!’须臾雨大至,雷电交作,阴浦之木尽拔。”这段神话有四个要点与其它神话相链接:一、《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所谓“鼓其腹则雷”与以上“其声如雷鸣”“鼓腹而遨游”都是说的这种雷神在飞行时会发出雷一般的轰鸣。二、“龙身人头”在古汉字和贺兰山岩画中还有更加形象的写照,例如古文𪚮(夔)字就是画的“龙身人头”,上方𪚮是上帝高祖夔的头部形象(人头),下方夨是上帝高祖夔的雷神(龙身),合起来就

① 𪚮(龙)𪚯(凤)二字头上的平和平都是采(帝)的转注字,转注过程是:采→采→采→平→平。卜辞中有“帝史凤”语,神话中的龙凤均为帝之使者。《世说新篇·西凤本纪》曰:“有凤西来,啁啾不已,烈日穿云,风呼地动。弃道:神物也!遂令匠人仿之。”可见凤为雷神之一种也。后世龙凤概念是延续古人之“自然观念”对雷神的解释,是一种历史的错误。“龙的传人”实为“雷神传人”,亦即“高祖夔之传人”、“帝之传人”等。

是“龙身人头”。再看图 38①,这是贺兰山岩画中画的“龙身人头”,下方是上帝高祖夔的☳形雷神,上方是上帝高祖夔的半身剪影。由此可见,这出于东海、阴浦和雷泽以及其它水域的雷神,其实都是指上帝高祖夔驾雷神遨游四方。三、商代卜辞中的“帝”(高祖夔)也同样可以操纵风云雷雨,如卜辞中有“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令雷”等等,所以我国著名甲骨学权威胡厚宣先生说:“殷人认为帝在天上,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①。”这与神话中的雷神之“出入水则必风雨”“雷电交作”“阴浦之木尽拔”等是相通的。四、“有道则见”,即说这种雷神只为“有道之人”而显现。轩辕黄帝是有道之君,所以他在游于阴浦时雷神显现。还有上古巫覡,我们知道巫覡是人类文化的先驱,是人神之间的媒介,他们上稟于天神的教化,又把知识下教于庶民,而《国语·楚语下》曰:“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这里说的“明神”亦即上帝高祖夔的雷神,当上古巫覡达到“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的“有道”境界时,雷神就会为之降下(“明神降之”)。请看图 84 贵州宁明花山岩画,这是一幅典型的“明神降之”的岩画,其中的“无头巫覡”表示智慧已达空明,“人头作火(☺②)巫覡”表示“明心见性”(亦若空明),“头戴干角巫覡”表示上稟于天神的教化,“头扎三根椎髻巫覡”表示对上帝高祖夔(夔)的崇拜,“长臂接日巫覡”表示巫覡与明神的直接关系,而掺合在这些巫覡之间的圆形闪光体就是上帝高祖夔的“明神”。“明神”者“光明之神”也,亦即闪光的雷神。所谓“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在上古图文史料中,人间帝王和民族始祖的出生均与雷神有关,均为“雷神之子”。例如《太平御览》曰:“大迹出雷泽③,华胥履之,生宓牺(伏羲)。”《帝王世纪》曰:“(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路史》曰:“哀

① 见《历史研究》1959年9期《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上)》,第25页。

② 这种“人头作火”的岩画与古文火(☺)字的相通,意味着当时可能已经有古汉字系统。

③ “大迹”在古籍中也叫“大人迹”“巨人迹”“神迹”“天迹”等。“大迹出雷泽”即说明这“大迹”实为“雷神之迹”。

履大人迹而生帝誉。”《春秋繁露》曰：“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春秋纬元命苞》曰：“黄帝时，在星如虹，下流华渚<sup>①</sup>，女节梦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少昊）。”《史记·补三皇本记》曰：“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太平御览》卷七九引《河图》曰：“瑶光之星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黑帝颛顼。”《诗纬·含神露》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帝舜。”《史记·夏本纪》曰：“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因天帝之“神珠”而生的帝王除大禹以外，还有如下：《诗经·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始祖契）。”《烈女传》曰：“契母简狄者，有娥氏之女，当尧之时，与其妹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sup>②</sup>，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史记·秦本纪》曰：“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秦族始祖）。”杨雄《蜀王本纪》曰：“禹母，吞珠孕禹。”《东华录·天命》讲满族始祖爱新觉罗的出生是“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总之，“雷神”神话是先民的原始宗教神话意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在研究古汉字形义系统时万不可忽视的古文化层面。抛弃雷神神话，上古历史不可解。史学研究，应当以“史料”来说法，而非以长期以来形成的或先前权威制定的某种“框框”来说法，后者将会把“史学的进步”变成“水中月，镜中花”，从而失却史学的真正的意义。

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时代，先民把自然人间的一切都归于上帝的创造：宇宙是盘古大帝的化身，人类是天上神女娲创造的，农业是后稷从天上带回五谷嘉种开创的，文字是仓颉因“上天作令<sup>③</sup>”而创造的，法律是皮肤绿色的皋陶从天上带来的，就连音乐也有夏启从天上带回的《九辩》《九歌》，等等。应当正是基于这些古神话传说所反映的上古“天帝史”，我国著名学者何新在《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序言中道

① 下流华渚：即说彩虹一样的雷神向下流淌着水一样的光瀑，注入到正在水中一块陆土上的女节身上，女节“梦接意感”而孕生少昊。

② 就像雷神有许多异名一样，“神珠”在古籍中的异名有“卵”“珠”“薏苡”“朱果”等。

③ 宋《路史·史皇氏》曰：“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上天作令，为百王宪。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形位成文声具，以相生为字。”

出了令人震惊的卓见：

华夏民族的先史时代是极其灿烂而浪漫的。但是，宋明以后文明臻于成熟，成熟则呈老暮，老暮则失去了浪漫的华彩。因之，这个民族在清代的语言考据和 20 世纪初的新考据学（古史辨学派）中，竟迷失了民族文化的自我，数典乃至忘祖，竟迷失了民族的本源。殊不知，华夏民族本是来自天上的民族<sup>①</sup>。

“华夏民族本是来自天上的民族”，真是振聋发聩，且与众多史料相合。但是，谁又敢迎合这种勇者的卓识？谁又敢在教科书上写入“华夏民族本是来自天上的民族”？难道“走出迷茫”之后，华夏子孙追溯的竟是九天之上的煌煌故土？难道天文学家会首肯古史学家声称华夏文明的古老渊源在天蝎座<sup>②</sup>？难道商周甲骨金文、上古神话传说、上古岩画陶文中所描述的上帝高祖夔真的是来自天蝎座的华夏始祖？真是“殊不可考”！真是“路迢迢其修远兮”！

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迷茫”的根因，即在于没有脚踏实地地在商周甲骨金文、上古岩画陶文等上古图文史料的“象形系统”中下大功夫！如果我们结合古神话传说对这个“象形系统”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并产生较为充分的认识后，我们就会对中国古史产生重大彻悟！反之，如果我们纯粹只在后世古籍记载的古神话传说中打转转，那么我们必将永远也走不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迷魂阵，永远也不能“超越疑古，走出迷茫”。

释读古汉字形体原理和本义的关键，在于透彻汉字三要素：象形字、转注字和指事之点（详后“六书的基本要素：三要素”）。指事之点只有依附于象形字或转注字才能成字，否则它就是不能成立的“虚无之点”。转注字是由象形字简化来的表义符号，只有懂得转注字的母体象形字，才能懂得转注字的本音、本义和注音、引申义（详后“本音转

<sup>①</sup> 《龙：神话与真相》何新著，时事出版社 2002 年，第 1 页。

<sup>②</sup> 史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普遍笃信天蝎座主星大火星，认为上帝高祖夔来自天蝎座。



注字与注音转注字”一节)。所以,研究古汉字形义学,关键在于研究“象形字”及其简化出来的“转注字”和“转注链”。由此,才能懂得其余四书(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的形音义原理。由此,也才能通过博大精深的古汉字关系网络来释读出华夏英祖亲笔记载的“华夏第一史册”,从而令今天的炎黄子孙对华夏初史“犹如亲睹”。本书的核心,是“象形”“转注”两章,其余部分都是根植于此的。

揭示汉字起源及其早期原理的同时,我们也必然要揭示古汉字的“本义系统”。这个“本义系统”所记载的上古神话史是“原版”的,与后世流传下来的古神话史是“本”与“末”的关系。“本”(原型)是固定不变的,“末”(变型)是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而有所讹变的。古汉字“本义系统”可以验证后世流传的古神话传说中哪些是古老的原版、哪些是后世的讹变与附会。也就是说,古汉字“本义系统”正是一部最古老、最权威的上古神话史,后世流传的上古神话史中的许多谜倪都可以由她来澄清,而澄清之后,我们距中国古史的大真相,大概也就“一墙之隔”了。